

高等师范专科学校通用教材

中国 现代 文学

中南五省(区)师专
《中国现代文学》
教材编写组
(上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上编）

中南五省（区）师专《中国现代文学》教材编写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8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印张16.75 字数376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500

ISBN7-5633-0507-6/G·446

定价：4.40元

前 言

教材建设是学校三大基本建设之一。长期以来,高等师范专科教育没有一套具有自己特点、较为系统的教材,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为了深化高等师范专科教育的改革,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培养更多的合格教师,中南五省(区)教委(高教局)高教(教学)处,共同组织五省(区)师专及部分有关高校的教师,协作编写了师专12个专业85门主干课程的通用教材。

编写这套教材的指导思想是,从高等师范专科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出发,根据国家教委新制定的二年制师专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要求,兼顾三年制和双科制专业的需要,力求突出适用性、科学性及高等师范专科教育的特点。因此,这套教材,不仅适用于普通高等师范专科教育,而且也适用于教育学院和电大普通师范教育相关专业的教学,同时,还可作在职初中教师的培训和自修教材。

这套供师范专科学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使用的《中国现代文学》教材,把习惯上已经分别称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两个部分的内容,合编在一起,统称为“中国现代文学”。这当然不是我们的创造,也不是我们的故作立异标新。我们这样做的主要根据,一是现行师范专科学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注明了“含当

代”的；二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虽然有很多理由可以区别开来，但是它们之间的共同性远远超过差异性。

发端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半期的“文学革命”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这里使用的“现代”一词，绝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且更主要是一个思想概念、文化概念。中国现代文学正是以其所使用的现代语言和所表现的现代精神，而与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文学形成鲜明的对照。充溢于现代文学中的现代精神，是在源于西方的科学、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变革的渴望与开放的要求。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们，大都受过西方现代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革命思潮的熏陶。这种熏陶一经与他们对中国传统社会落后、闭锁状况的了解结合起来，便培育了他们深广的忧患意识。这样的忧患意识表现在文学上，就形成了全面改造社会以赶上外部世界前进步伐的强烈愿望。为了追求这一愿望的实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及后继建设者们，对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的封建文化，采取了决绝的态度，也使他们为了振聋发聩而不断地向社会发出变革的呼喊。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呼喊“救救孩子”；1977年，刘心武在《班主任》里呼喊“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这不是后者对前者的有意的模仿，也不是无意的雷同，而是文学中现代意识流贯了大半个世纪而没有止息的明证。

当然，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其中最明显的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分野，形成前后两个大的阶段。这后一阶段的文学，仅从其主体——大陆文学上看，具有积极意义的变化是注重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教育人民，注重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创造；具有消极意义的变化

则是不注重自由思想的表现，不注重创作个性的发展。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文学自身的改革之势正在勃兴；社会主义文学多元化的开放性局面正在形成。这个情况，是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基本同步的。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文学，仍然属于“现代文学”范畴。不过在叙述上，为简明方便起见，我们不时使用“当代文学”这个术语。

上述认识的是非得失，我们自然不敢必定。

这套教材的编委会，由下列人员组成：执行主编韦启良（广西河池师专），副主编刘诚言（湖北襄阳师专）、程凯华（湖南邵阳师专）、詹行锋（海南师院），编委胡世瑚（河南平顶山师专）、张芳彦（湖北咸宁师专）、唐广瑞（湖南郴州师专）、钟文光（广东韩山师专）、韦秋桐（广西河池师专）。由于实际工作的需要，平顶山师专的胡家才、袁桂娥，咸宁师专的胡志伟，邵阳师专的钟琦新、沈敦中，河池师专的范肖丹、颜新云等，或参加了初稿讨论会，或承担了一定的编写任务。初稿经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刘泰隆教授的认真审订，并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精心编辑。我们谨向有关各方，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套教材是按主编负责，分工编写的原则成书的。由于这样大规模有组织地进行教材编写在我们还是第一次，因而错误缺点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教正。

中南五省（区）师专协作教材编委会

1988年3月

目 次

前 言	(1)
第一章 文学运动发展概况	(1)
第一节 “五四”文学革命	(1)
第二节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22)
第三节 抗战的民主的文学运动及其发展	(41)
第二章 小 说(上)	(56)
第一节 概述	(56)
第二节 鲁迅小说	(73)
第三节 叶绍钧和郁达夫的小说	(108)
第四节 茅盾的小说	(123)
第三章 小 说(中)	(144)
第一节 巴金的小说	(144)
第二节 老舍的小说	(158)
第三节 蒋光慈、柔石和叶紫的小说	(174)
第四节 张天翼、沙汀和艾芜的小说	(186)
第五节 沈从文、李劫人和钱钟书的小说	(197)
第四章 小 说(下)	(213)
第一节 赵树理的小说	(213)
第二节 孙犁的小说	(223)
第三节 丁玲、周立波的小说	(234)
第五章 诗 歌	(246)
第一节 概述	(246)
第二节 郭沫若的诗	(260)

第三节	闻一多、徐志摩和戴望舒的诗	(278)
第四节	艾青的诗	(301)
第五节	殷夫、蒲风的诗	(312)
第六节	田间、臧克家的诗	(323)
第六章 散文		(352)
第一节	概述	(352)
第二节	鲁迅的散文	(367)
第三节	冰心、朱自清和周作人的散文	(399)
第四节	瞿秋白、茅盾的散文	(417)
第七章 戏剧		(426)
第一节	概述	(426)
第二节	田汉和欧阳予倩的戏剧	(446)
第三节	夏衍和洪深的戏剧	(459)
第四节	曹禺的戏剧	(474)
第五节	郭沫若和阳翰笙等人的历史剧	(493)
第六节	丁西林和陈白尘的喜剧	(509)
第七节	《逼上梁山》和《白毛女》	(521)

第一章 文学运动发展概况

第一节 “五四”文学革命

一.文学革命发生的原因

中国现代文学,亦称新文学,发端于“五四”文学革命。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是我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我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同时,它又与外国文学的影响分不开。

“五四”运动前几年,我国知识界出现过一个思想启蒙运动,这个运动是在辛亥革命趋于失败,袁世凯尊孔复古,阴谋称帝,“民国”招牌也岌岌不可保的情况下发生的,同时又是在中国民族工业乘欧战之机得到较大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有了显著增长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激进知识分子,鉴于国内政治局面混乱,日、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掠夺,而旧文化、旧思想又严重阻碍着广大群众的觉醒,因此,他们奔走呼号,致力于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运动,以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的局面。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的《新青年》便是适应这一启蒙运动要求而诞生的一个重要刊物。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中心内容,概括起来,约有三点:一是提倡民主,要

求打倒“孔家店”，反对封建政治与封建礼法和伦理；一是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独断的封建哲学和宗教；再一是为了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为了广大群众的启蒙而进行文学改革，提倡白话文、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旧文学，以及所谓的“国粹”。发表在《新青年》创刊号上的由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实际把“五四”时期所要求的“德谟克拉西”、“赛因斯”二先生，即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初步揭示了出来，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要求和基本精神初步体现了出来。《新青年》所倡导的这个思想启蒙运动，把要求民主与科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联结起来。因此，它成为“文学革命”的前驱。

新经济、新政治力量的壮大，要求新文化、新文学必须有相应的发展。文学革命能迅速地适应这种要求，还因为它有近代进步文学的基础，有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就用诗歌揭示了当时“万马齐喑”的时代痛苦，呼唤着革命的“风雷”，希冀着民族的“生气”，表达了反抗列强的意愿。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不仅产生了一些较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而且提出过“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虚浮”的文学改革主张。到了19世纪末叶，在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的影响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文学运动也日趋高涨，谭嗣同、夏曾佑、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提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推行“新文

体”，他们反对复古，“崇白话而废文言”，提倡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主张改良旧文体，“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在理论上打破了因袭已久的清规戒律，在创作实践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小说，一时被认为是“改良社会”、“开通民智”最有效的工具，受到重视，竞相提倡，于是出现了象《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主张的“谴责小说”，在不同程度上，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谴责和评击，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此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相应地产生了章太炎、秋瑾的爱国诗篇，陈天华的通俗小说，南社作家的进步作品。这些作家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时代内容，反映了我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要求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的迫切愿望，对民主革命和文学改革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话剧也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称为“文明戏”、“新剧”，得到政治革命的助力。新剧中批判封建官吏、攻击旧道德、激发爱国热情的一些戏，曾经受到群众的欢迎。所以，尽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是软弱和动摇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学没有出现思想艺术的高峰，文学改良也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近代进步文学对“五四”文学革命却有其一定的积极影响，它所包含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以及在文学形式方面的改革诗文，提倡白话，重视小说和输入话剧等等，都为“五四”文学革命和我国新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的兴起还受到外国文学的巨大影响。外国文学主要是欧美资产阶级文学，自清朝末年便开始逐步译介到中国来。清末民初，梁启超提倡译印政治小

说，并自译《佳人奇遇》等书；严复译《天演论》，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林纾自《巴黎茶花女遗事》起，翻译了180多种欧美的说部；鲁迅翻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和编译《域外小说集》，都开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先河。但外国文学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主要是“五四”时期。“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大都认为介绍西方文学是创建中国新文学的“路子”之一，所以陈独秀提出以灿烂的欧洲文学为楷模，胡适主张以西洋近代文学为范本，周作人提出以西欧人道主义文学为榜样。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五四”前夕，外国文学大量翻译过来，总计不下600余种，特别是英、法、俄、北欧诸国的作品蔚为大观。这些作品大都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和个性解放的要求，正投合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因此引起很大震动。比如，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题目到内容，都受到俄国作家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很大影响。鲁迅自己就说：“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①他说创作《狂人日记》时“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②“五四”诗歌的代表作家郭沫若，也深受外国作家如歌德、海涅、惠特曼、泰戈尔等的影响。“五四”时期另外一些有影响的作家，如周作人、谢冰心、郁达夫、闻一多、郑振铎、叶绍钧，无一例外地都受到过外国作家或轻或重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外国文学的影响对“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的兴起，起到了催生的作用。

二.文学革命的经过和性质

①《鲁迅书信集》（上卷）：《致董永舒》，1933年8月13日。

②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五四”文学革命是于1917年初由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首先发起的。但是在此以前一些进步报刊已经有所酝酿和鼓吹。1915年到1916年期间，李大钊在《国民之薪胆》、《厌世心与自觉心》、《〈晨钟〉之使命》等文章中，阐明了一个国家新文明的产生与新文学的勃兴之间的关系，认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据此他反对“柔靡艳丽”、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学，希望一些觉醒的青年和哲人，能够创造出“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界之发展”。陈独秀发表了《欧洲文艺史谭》的长文，介绍西方进步的文学思潮，并在一篇通信中，针对当时封建文艺“浮华颓败之恶风”，提出了中国文艺应当抛弃“古典主义”而趋向“写实主义”的思想。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同少数学友研思辩论文学改良的问题，并于1916年底给陈独秀的信里，在批评旧文学腐败的同时，从“言文一致”的要求出发，首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概念和改革旧文学的“八事”主张，这些酝酿与鼓吹实际上可以视为“五四”文学革命最初的思想萌芽。

“文学革命”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终于在1917年初正式提出。胡适首先拉开了序幕。他在1917年1月《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系统地提出文学改革的主张。他认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还认为，真文学“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须有“高远之理想”、“真挚之感情”，并要求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正宗地位。这些主张，切中了旧文学形式主义、拟古主义的弊端，有破旧立新精神，并提出了一些重大见解，基本

符合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要求，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新文学倡导者的较高评价。但他所说的“八事”，多着眼于文学形式的改良，通篇避开“文学革命”的字样，确有气魄不足之嫌。

鲜明举起“文学革命”大旗的是陈独秀。1917年2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公开地“高张‘文学革命军’的大旗”，并在旗上大书特书反对封建文学，建设新文学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认为，封建的旧文学，“其形体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其批评锋芒直指旧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抨击之态度亦比胡适猛烈和激进得多。他把文学革命当做“革新政治”的“利器”，“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对改革语言工具的态度亦鲜明果决：“改良中国，当以白话文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

《新青年》的文学革命主张反映了历史的趋势和时代的要求，很快便得到一些志同道合青年的响应。钱玄同在给《新青年》编者的许多信中最早表示了“绝对赞同”的态度。他对封建旧文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1917年3月致陈独秀信中第一次把专事拟古而风行一时的骈文和散文大家指斥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他还从语言文学演化的历史事实为“言文一致”的观点和白话文学应为文学之正宗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刘半农发表了《我之文学改

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探讨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界说，对于破坏古文的迷信、建立美的白话散文，破坏诗歌旧韵、重建新韵等问题，都进行了建设性的研讨。钱玄同的《〈尝试集〉序》、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议》，或从文学语言与口语分化的历史，或从文学发展新陈代谢的规律，论证了新文学代替旧文学是势在必行的。1917年8月，钱玄同还第一个提出《新青年》发表文章应“渐渐改为白话”，并表示从这时起自己一切文章通信躬身励行。这些文章和意见，猛烈地冲击着封建文学堡垒，促进了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

《新青年》上出现的这场关于“文学革命”的热烈讨论，对于广大文学青年虽无异于空谷足音，但却未触痛文坛上的那些守旧派，他们对这些“异端邪说”缄口不置一辞。为了扩大影响，“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便演出了一出“双簧戏”：1918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三号在《文学革命之反响》这个总标题下，发表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一篇是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写的《王敬轩君来信》，集中了社会上各种咒骂、攻击新文学的论调；另一篇是刘半农执笔写的《复王敬轩书》，逐段驳斥了守旧派的谬论。这就是鲁迅称道的“双簧戏”。

“双簧戏”演出后，鲁迅发表了猛烈攻击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小说《狂人日记》和杂文《我之节烈观》及一系列的“随感录”，胡适则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十字“宗旨”，并把他的“八事”概括为“八不主义”。随后，周作人也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这样一来，“文学革命”的声势和影响越来越大。

与晚清以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比较，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了更系统的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将已经偃旗息鼓的晚清文学的改良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向高潮，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他们所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在反对封建主义与旧文学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他们的主张，多从形式方面着眼，有的观点，表现得过于偏激，有的地方，却表现得很不彻底，当问题转到另一方面，即要建立怎样一种新型的文学时，回答却欠具体明确。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局限，不论胡适所提出的文学改良的“八事”，或是陈独秀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以及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范畴，因而都不可能彻底推翻封建旧文学，不可能产生适应时代要求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现代新文学，更不可能把文学革命引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运动。

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于新文化运动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式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处于这一新的历史时期里的文学革命，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第一个显著变化，是随着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出现，以《新青年》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盟主，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同盟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后翼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文学革命运动逐步显示出空前的声势，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运动。

第二个显著变化，是在1918年特别是“五四”运动以

后，《新青年》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文学革命的理论指导，无产阶级思想开始迈步踏入新文学领域；“为人生”、“表现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逐渐取得优势。

第三个显著变化，是出现了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等一批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作品。这些新文学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革，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标志着文学革命突破了初期理论主张的局限。

第四个显著变化，是外国文学的译介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俄罗斯、欧洲各国、日本、印度的文学名著大量译介过来。先驱者们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放到最重要的地位，反映出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的决心，进步文学界从最初眼看西方转而注视俄、苏，说明了文学革命已酝酿和发生着质的变化。

从文学革命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1916年至1917年的文学革命，是由资产阶级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发动的一场旧民主主义的文学运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当然谈不到阶级属性，但当时为反对封建旧文学所要建立的新文学，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为样板，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民主、自由、人道作为指导思想的，所以，从根本性质上说，它只能属于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范畴。但是，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文学革命的性质，逐渐发生着变化，向着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转变。一个决定的因素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作用日渐加强，文学革命日益增添着新的内容，它已经不满足于科学、民主、人道的抽象说教，而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芒，达到了彻底反帝反封

建的新的思想高度。文学革命在反对封建文学之后，所要建立的新文学也不再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为样板，而是以苏俄文学为榜样了。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无产阶级对新文学的思想领导更是空前加强了。

文学革命从1916年、1917年资产阶级思想居指导地位，到1918年特别是“五四”以后，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占优势，正标志着这场革命性质的转变。这一事实说明，无论把文学革命从始至终简单地笼统地看作旧民主主义性质或新民主主义的性质，都是不科学的；只有把文学革命看成一个发展过程，并将“五四”时期作为新、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分水岭，才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三.文学革命的意义和局限

文学革命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的文学革新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从思想意义看，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封建的思想文化，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加快了中国的民众觉醒和社会进步；从政治意义上看，文学革命在“五四”运动前夕发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做了舆论的准备。“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学运动又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内容，它不但坚决彻底地批判了封建道德、封建文学，还积极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在运动的进程中，形成了由三部分人组成的统一战线，从而为中国革命作了理论、干部的准备；从文学的角度看，文学革命带来了文学观念、内容、形式各方面的大革新、大解放，宣告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和现代文学的诞生，把中国文学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从此以后，“五四”文学革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